

“中国哲学的传统、现状与展望” 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泽亮 胡 雷

由武汉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国哲学的传统、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0月11日至14日在武汉举行。国内部分中西文化与哲学研究专家等60余人与会,就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现代转型、传统哲学与现代化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传统与新诠 任何民族成功的现代化都必然而且主要是在本民族的思想资源的滋养下成功的,这样才不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而要透析传统对现代化的本根意义,首先必须对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内在理路和内在精神进行客观准确把握,并进一步在与世界文化的相比较相融摄中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和扬弃。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或深入挖掘儒、释、道三大传统资源的丰富内蕴,或从明清学术思潮与近、现代文化思潮中寻找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点,或从西方哲学视角透视中国哲学的特质,针砭传统哲学的某些痼疾,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有学者认为,儒学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儒者在对世间的肯定和关怀中,仍有其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目标和救世献身的热忱,至诚无息、虔诚无欺的神圣感,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的安身立命感、责任感、当担意义、忧患心态和力行实践精神,特别是信仰信念上的终极“心性论”是宝贵的思想资源,具有永恒的价值。有学者指出,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都源于《易》,人文易(以儒家为代表)和科学易(以道家为代表)是传统哲学与文化的两翼。在传统哲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儒学道家化的问题。从某种角度上看,道家比儒家更能体现传统哲学的内在精神,现在是道家重新证明自己的时候。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本土之萌蘖是明清早期启蒙学术。它作为传统文化转型的开端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有学者认为,近代哲学的困境在于,由于18、19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拒绝建立本体论,使近代哲学不得不继续重视建构本体论。也吸取了不少西方近代本体论思想,却最终陷入“二元论”、“不可知论”或“体用二元对峙”的矛盾。在现代哲学中,只有现代新儒家克服了近代哲学本体论缺陷,并从认识论开出本体论,从传统的实在、存在领域推进到生命、价值、文化领域,展示出近代哲学的出路。

有学者从西方生存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认为与西方古代辩证法相比,中国古代辩证法由于缺乏内在的生存动力,缺乏个体能动性因素,因而未能深入到个别事物真正内在的自我否定力量,未从自我否定出发把运动看作同一事物自我综合的能动过程。其矛盾学说根本上是一种“耦之中又有耦”的外因论,其结果是导致人放弃和抹杀自己的个体生存,而听任于自然和社会早已给自己规定的命运。有学者从哲学人类学方面考察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人类学有四种类型,即道德人类学、自由人类学、神学人类学、自然人类学。有的学者探讨了中国古典自然哲学的元理论,认为中国自然哲学的有机范式的元理论可分为整合合原理、交感互补原理、复杂相关性原理、动态演化原理和人格泛化原理。

二、当代意义与未来走向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当代意义,与会者提出了两种相异的观点。有学

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人与天、地、人、我日益疏离的社会。人们生存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荒谬处境中，面对的是无信仰、无信念、无本无根的人生。而现代化的科技文明并不能代替现代人思考生命与死亡等等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因此再倡、重建传统文化与哲学对借助人类古老文明的精神提高现代人生活的品质与人格的境界，促进社会有序化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至少具有五个层面的意义：1. 知识层面：对青少年进行国学ABC的教育。2. 学术层面：继绝学，传道统，挽救学术失传、学统不彰的危机。3. 道德价值与人生追求的层面：提倡理想人格的追求，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的失落。4. 终极关怀的层面：如儒家对终极真实的主体性体认等是救治“世纪末病”的良方。5. 国魂与族魂的层面：有助于克服民族及人类素质的贫弱化和民族本己性的消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源远流长的哲学文化传统面临着生存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思考拘泥、局限于文本、资料本身的疏解与阐释，而不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建构。另一方面是文化市场化走向促使大众文化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书斋式研究形成巨大冲击。面对这种危机，有责任心的文化人应主动地介入，影响、引导大众文化，带领民族精神向前发展。有人指出，企业文化、村社文化向主体文化靠近，主体文化向家庭、民间渗透，显示出文化由学苑起向民间的市场化与趋同化路径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企业文化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这一事实恰好为我们寻找一条振兴中国哲学的出路。

关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未来走向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中国未来文化与哲学的理论来源。有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崭新的革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只有在对三个传统：即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引进西方文化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进行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有学者则认为，“中华元典精神”，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及孔孟老庄等先秦元典所蕴含的原始整体智慧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本质内蕴，不仅近、现代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救亡意识等直接承继着中华元典精神，是对元典精神某种意义的复归，而且未来文化的走向也首先离不开对元典精神的现代诠释。还有学者认为未来文化建构应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相通之处如民本思想、大同思想等，作为新文化的接合点和生长点。二、未来文化模式。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未来文化模式将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情相结合为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相结合为用，一方面证实儒家传统，克服西方文化的缺点，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优点，使中西文化有机整合。也有学者认为，中西文化缺乏真正的比较和了解，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建立在指向世界的基础上的新文化，既非西学原版输入，又非中学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异常复杂的矛盾中动态地展开，并将运用多向方法论不断解决矛盾而得到发展，它应具有世界化与民族化、多元化与一体化、个性化与人类性等特质。

（责任编辑 严真）